



纪念当代最具影响力的考古学家路易斯·宾福德



李水城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

著

今年的4月某一天,学生温成浩见到我说,宾福德教授去世了。听到这个消息让我不尽一震,以至于不敢相信这是真的。遂追问,你从哪儿听到的?学生说,网上。

此后我一直为此有点怅然若失。因为自我接受在《南方文物》主持“考古大家”栏目以来,随时都在筹划,该选择哪位学者作为下一个采访目标?哪个人适合来做这个采访?等等,为此颇费脑筋。

不知是出于某种感应,去年底到今年初,脑子里突然浮出个想法,得尽快找人联系采访宾福德教授。可是,因为当时正忙于策划和审阅罗泰(Lothar von Falkenhuasen)、贝尔伍德(Peter Bellwood)两位教授的采访记,一时顾不过来。此事遂拖延下来。猛地听到宾福德教授不幸去世的消息,心情之沮丧可想而知!

7月,在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任教的洪晓纯来信告知,英国的《古代》(“Antiquity”)杂志不久前专门组织了一组文章,以表彰贝尔伍德(Peter Bellwood)教授在东南亚考古所作的杰出贡献。我想,这是个挺大的事,应在“考古大家”栏目的贝尔伍德教授采访记(《南方文物》2011年第三期)后面附加个说明。为此我与广明联系,顺便谈到了自己为没能抓紧时间联系采访宾福德而生的遗憾。但是,让我绝对没有想到的是,很快广明就回信告之,陈胜前博士已将伦福儒教授20多年前对宾福德教授所作的采访翻译出来,这个消息对我来说不啻像打了兴奋剂!

遂后广明将译稿寄我审阅。恕我孤陋寡闻,看到这篇采访,真是感触良多!首先要感谢伦福儒教授作了这么好的采访,可谓强强联手、珠联璧合之作。其次要感谢陈胜前博士的翻译,应该说他是国内做此事的最佳人选。最初我有了采访宾福德的念头时,第一个想到的就是他。此君曾在北大获硕士学位,后去美国做了宾福德的学生。几年前获博士学位回国,现受聘于吉林大学任教。总之,他们所作得工作非常重要,不仅仅是弥补了我的缺憾!

作为世界上著名的考古学家,宾福德教授的学术贡献有目共睹,我这里只想谈点感受。在我读大学时,对于西方考古学家的了解仅限于蒙特留斯(Oscar Montelius)、安特生(J.G.Andersson)和柴尔德(Gorden Child)等几位。对当代的西方考古学家则全然不知。1985年我返回北大,在那之前不久,宿白先生邀请张光直先生在北大作了《考古专题六讲》,在考古圈子、特别是年轻的一代引起不小的轰动。此后,逐渐才有西方的考古学理论和代表人物被介绍进来。宾福德是其中之一,而且是影响和争议最大的。此公曾在1985年访问过中国,并对周口店北京猿人遗址的用火遗迹和某些传统认识表达了不同看法,并因此招致非议。或许是时代使然,除了旧石器考古界以外,宾福德此次中国之行并未产生什么影响。

上世纪80年代中期,随着改革的推进,中国掀起了又一次文化大热潮,考古界也不例外。其中,除了大的社会环境背景外,张光直先生的演讲及演讲

录的出版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当时大家热衷的话题集中在：传统类型学研究的优劣、聚落考古、“新考古学”、宾福德、过程理论。这些讨论不仅为我们这一代所追捧，也影响到我们的老师一辈。

俞伟超先生是站在这个潮头的领军人物，他不仅热衷于参与讨论域外的理论思想和方法，还积极倡导鼓励翻译有关的文章和资料。实事求是地说，这些讨论、乃至于争论对于推动中国考古学的发展和理论建设很有裨益。记得那时和俞先生聊天，不时会谈及“新考古学”。有那么一段，他几乎经常谈论对宾福德产生重要影响的美国人类学家瓦特·泰勒(Walter W. Taylor)，在上世纪40年代末，此公对西方传统考古进行了猛烈攻击，提倡“缀合式研究法”(conjunctive approach)。但是，泰勒的这些前卫思想却得不到当时美国主流学界的认同，并长期遭受压制和打击，对此俞先生感到非常的困惑和不解。其实，这也恰恰是当时中国考古界的大环境以及他自己境遇的写照。回想起来，似乎每位先行者都有着类似的不被理解的一面！当年，宾福德被折腾了四年才拿到博士学位，就是因为他提出的新思想触怒了某些权威人士而付出的代价。

历史总是这样，尽管道路曲折，命运多舛，但社会毕竟朝着进步的方向发展。

这一时期，严文明等先生在北大开设了一些研究生讨论课。选课学生可任选某一领域的代表作，经课下认真研读，再到课上宣讲，大家共同讨论，先生点评，最后各自撰写出读书或研究报告。这类课程涉及面广，学生准备认真，讨论热烈，也常常会涉及当时的一些热点话题。诸如：考古学的基本理论是什么”、“考古学的基本理论是否就是类型学和地层学”、“考古学是科学还是历史”、“考古学与历史学到底是什么关系”、“把考古学，特别是史前考古学限定在历史学范畴是否合适”、“考古学的特点仅仅是以实物为特征吗”、“考古学作为历史学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可否将其划为古代史研究的高级阶段”、“能否将考古类型学、地层学视为考古学研究的初级阶段，而将‘新考古学’视为高级阶段”总之，这类课程开阔了学生们的眼界和分析问题的能

力，效果甚佳。

我就是在了《中国新石器考古研究史》这门课以后，写了篇有关考古学发展史的作业，在资料非常匮乏之条件下，尽可能客观地对“新考古学”做了些介绍评论。那时，西方考古学界对“新考古学”也是褒贬不一。但持肯定意见的学者认识到，宾福德的成就在于他提出，为了理解过去，仅仅靠发掘古代文物，并根据自己对这些文物的印象写一些直觉性的报告，这是远远不够的。这其中，伦弗鲁(Colin Renfrew)教授的评价相当正面。他指出：“从许多方面来说，考古学中最激动人心的新发展并非那些在实验室取得的新成就，亦非那些在完善测定年代的方法或研究早期社会环境方面取得的成功，而是在视野和理论基础方面发生的变化。……随着所谓的‘新考古学’的出现，研究人员重新确定了他们的目标。我们不再是只求再现过去的情况和简单地说明以往发生的事情，我们还要进一步弄清楚事物变化的来龙去脉。为此，就需要为考古学制订更为明确的理论体系，对旧的观点提出怀疑。如果我们的目标是要弄清楚事物变化的来龙去脉，那么对世界某一地区情况的研究，即可为理解另一地区发生的情况提供极有价值的线索。因此，‘新考古学’不是以种族为中心的，至少它避免以种族为中心。”伦弗鲁认为：“‘新考古学’比传统的考古学要乐观一些。许多传统的考古工作者认为，我们无法通过考古来了解古代的社会结构或宗教生活，‘新考古学派’不同意这种看法。他们认为，必须设法建立一种健全的理论，使我们不仅能够阐明饮食和技术等方面的情况，而且也能够阐明有关社会结构和宗教生活等方面的资料。……传统的考古学常常是从文化‘扩散’的角度来解释事物。他们认为，重大的进步，只发生在一两个地区，然后通过文化的‘扩散’逐步传到边远的野蛮地区。近年来研究人员终于认识到，这往往是一种殖民主义观点，意思是说，具有意义的发展只发生在少数几个关键的得天独厚的中心。今天我们认识到，要了解所发生的变化，就必须懂得所研究地区发生变化的过程。必须研究社会结构、人口发展，以及经济和技术等方面的变化。应

当承认,同其他地区的交流、新思想的输入,可能、而且确实在这一过程中发挥了作用,但不一定占主导地位。……现在(考古学)已成为世界各国许多人都感兴趣的一个领域。其部分原因是,它使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机会充分地了解本国的历史。但是,如果把注意力只集中于本国,那就是沙文主义。考古学还使我们有可能把每个国家的早期历史看作整个人类更大范围的历史的一部分。过程论考古学要求我们更好地理解人类文化的多样性、它的现在和过去。由于科学给我们带来了一系列的技术,由于‘新考古学’的严谨和自觉性,这就使我们可以比较容易地做到这一点。”

我在文章中把伦福儒的这些观点作了介绍,但也有点小骂大帮忙。后来听说,当年我写的这些文字能发表出来还颇费了些周折。今天回过头看,一方面为中国考古学取得的巨大进步而备感欣慰,另一方面也深切感到学科的发展任重道远!与此同时,也更加怀念俞伟超先生,并为中国考古学界能有这样一位富有远见的‘先知’而备感幸甚!

今天,我们对宾福德和他倡导的“过程考古学”的认识较之25年前是更加地全面深入,也更为客观实际。但就在当年,我们也感到宾福德将考古学视为自然科学的做法非常不切合实际。包括‘新考古学’设定的研究程序,即首先是产生假说,这些假说有着不同来源;其次是形成实验这些假说的前提,第三是在考古作业中加以实验。若能证明假说,则表明假说正确,否则反之。这种结论先于资料的做法,包括很多西方学者也不认同。张光直先生曾对此表示:“考古学有它一定的程序,即首先把发掘的资料整理出来,在有一个非常坚实的年代学基础后,再去做比较抽象的社会科学法则性的研究,这才是一个比较完满的研究方法。”

斯人已逝。尽管‘新考古学’并非尽善尽美,但这并不影响宾福德作为考古学发展史上的里程碑式人物。否则,《科学美国人》杂志也不会如此轻易地将宾福德教授评选为“当代最具影响力的考古学家”。今天,我们纪念宾福德,首先要学习他在学术

研究上的执著探索;其次是勇于开拓的实践精神。比如他为了能更好地理解4万年以前莫斯特时期狩猎民族的考古遗迹,前往阿拉斯加长达四年,在那儿研究仍旧过着狩猎生活的现代爱斯基摩人,包括他们生活中那些非常有考古价值的东西,研究狩猎民族如何对待和利用周围的环境,以及他们的行为在考古学上的含义。他留下的这些宝贵遗产值得我们认真地咀嚼领会,也特别值得科技考古工作者认真效仿学习。

随着学科的发展进步,考古学家必须努力了解和掌握更多其它学科的知识,这是时代的要求。如今,考古学正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技术革命姿态被载入史册,但这一切并不意味着考古学已变为一门自然科学,或考古学家将成为自然科学家。今天,在考古学家周围辐集了一批来自不同学科领域的专家,在他们的合作参与下,考古学广泛地利用各种自然科学方法,努力对残存在各类遗物上的种种遗迹遗痕做出合理的判断和阐释,试图从更加多维的角度提取人类历史档案中的信息,以重现人类往昔的生活、环境、经济和技术。可以说,现代考古学正成为一个多学科作业的汇合点,但今天的考古学家仍旧在潜心研究两百万年以来的人类社会和人类文化,仍在研究人类社会的发展历史,而非自然史。

仅以此文,纪念路易斯·宾福德教授。

李水城

2011年8月于北京兰旗营

注释:

张莉:《罗泰(Lothar von Falkenhuasen)教授访谈录》,《南方文物》,第66~73页,2011年第2期。

张光直:《考古学专题六讲》,北京大学考古系专题讲座之一,文物出版社,1986年。

李水城:《考古学发展史的回顾与思考》,《庆祝苏秉琦考古五十五年论文集》,第129~143页,文物出版社,1989年。

科林·伦福儒:《考古有何新成就》,《信使》(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8页,1985年9月(总第63期)。